

第一章 绪论 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特点和地位

一、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特点

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成为划分封建社会前、后期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宋代也就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开端。其重要标志，一是农业生产关系上租佃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租佃制的重大意义在于由此而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生产者与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削弱，租佃制下两者的关系更显示出经济关系的色彩，生产者因而具有更大的自由，这就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余地。

自战国秦汉以来，商品经济曾经历了大的起落。战国秦汉时期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宋代则成为第二个高峰，中间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商品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秦汉商品经济的衰落，最早应追溯到西汉中叶汉武帝对工商奴隶主的沉重打击，此后随着大土地势力的发展，生产者农民逐步依附化，庄园农奴制成为主要的生产关系，商品货币经济也走向没落，东汉“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①。东汉以后，物物交易逐步流行起来，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②。南北朝

① 《后汉书》卷 43《朱晖传》。

② 《晋书》卷 26《食货志》。

时期，南方商品经济略有发展，北方则主要仍是物物交换，反映在国家赋税政策上南方则有“关廛之税”征收商税而北方“唯受谷帛之输”^①完全为实物税。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最早指出南北地区财政上这一差别。唐代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中唐租佃制逐步确立后，商品经济才又进一步发展起来，并在宋代达到高峰。战国秦汉与宋代同为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但在商品经济的内容上却有很大不同，因而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我国古代的市场商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区特产品，以盐铁类商品为代表；另一类是粮食与布帛类商品。

我国国土辽阔 东西南北在地理、气候等方面的差异很大 所以形成了地区间物产的巨大差别，有些物产的生产只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地区，而这些物产又是人民生产、生活之必需品，这些产品以商品形式流通以供给于人民生产和生活之用，构成了早期商品经济的主要内容。主要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需要的奢侈品贸易也属于这一类型。这类商品的贸易是由于物产的地理差异性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所以它的发展较早，甚至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部落之间的交换中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战国以来直到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以地区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为主要内容和特点的，以盐铁商品最为明显，盐铁生产都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只能在特定的地区生产，但又是人类生活和生产不可或缺的，所以盐铁商品成为商业史上最早的大宗商品。盐铁贸易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生产和贩运上都需要集中使用劳动力，生产需要协作，运输上因数量大、路途远也需要大量劳动力；二是盐铁生产和运销都需要数量较大的资本。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从事盐铁业的必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商人，非一般贩妇贩夫可以染指。这决定了春秋至秦汉时期活跃在商业领域的主要是盐铁大商人，

^① 《魏书》卷 68《甄琛传》。

他们所从事的主要是长途贩运。“猗顿用鹽盐起。而邯鄲郭纵以铁冶成业 与王者埶富”蜀卓氏、宛孔氏、程郑氏、曹邠氏都以冶铁而富 刁间以渔盐之利富。《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这两部汉代著名的著作中都特意列举了各地区的特产品，也说明当时商业上地区特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商业特点。在汉武帝之前，国家尚没有垄断盐铁之利，只有齐国管仲曾将盐铁之利收归国有，并以之作为称霸的经济基础，除此之外，盐铁之利则为大工商业主所拥有。他们一般是拥有大量奴隶的工商奴隶主，“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如蜀卓氏即有僮千人。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又与大量的奴隶制残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外他们所从事的多是长途贩运，如郑贾弦高西市于周^②，另一郑贾南至于楚、北至于晋^③。宛孔氏之先人也是“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④。再如孔子的学生子赣“鬻财于曹、鲁之间”^⑤。秦相吕不韦早年也是游于四方的商贾。总之，地区特产品的长途贩运是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的主要特征，盐铁商人的兴起和长途贩运的发达与之有密切的关系。与商业的这一特征相一致，市场分布上，春秋战国时期涌现的一批商业都会都是集中于交通要冲，如临淄、邯鄲、陶、宛等商业都会。在币制上除价值较低的铜铸币之外，这一时期贵金属黄金的使用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奇葩独呈，实际上黄金的使用是与这一时期大工商业的发达以及长途运销密不可分的，正如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贵金属货币的使用与海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紧密相联一样。由于这种特产品贸易为主的商业并不是社会生产普遍分工扩大的结果，所以它也具有脆弱性，一旦国家实行严格的盐铁政

① 《盐铁论·复古》。

② 《吕氏春秋·悔过》。

③ 《左传》成公二年。

《史记·货殖列传》。

⑤ 《史记·货殖列传》

策，将盐铁产业收归国家经营，主要由盐铁贸易造成的商业繁荣立刻就衰微了，所以汉武帝打击工商奴隶主和盐铁官营以后，中国古代的工商业也就出现了一次大的倒退，终于在南北朝时期重新回到以物易物的水平。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在量的方面远远超过战国秦汉，更重要的是在质的方面与战国秦汉有很大的不同。商业的主要内容从盐铁贸易变成了米绢贸易。地区特产品的贸易在宋代仍有较大的发展，在商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消费量的提高，盐、铁、茶叶、蔗糖、水果等山泽之产的交易都很大，是市场上的重要商品。盐茶和部分矿产品主要仍由国家垄断经营，但在经营方式上则由官般官卖逐步向官商分利的通商法转化，后者逐步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而对于经济作物及其他特产品则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府不加干预而只征收商税，“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①所反映的就是地区特产品贸易的情况。

宋代商业发展最具时代特色的是，除地区特产品的贸易外，农产品粮食和原先主要是作为家庭手工业产品的绢帛，大量走向市场，转化为商品，并且成为商业领域的主要商品。如果说战国秦汉商业的主要内容是盐铁贸易，那么宋代商业的主要内容则在盐铁之外，进而以米绢贸易为主，“商贾通殖货财，交易有无，不过服实器用，米粟丝麻布帛之类”^②。米绢贸易比之盐铁贸易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意义。粮食生产和纺织手工业生产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行业，人民生活一食二衣，米绢类商品直接关乎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米绢成为重要商品标志着生产与市场联系的扩大，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是商品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发展的直接

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6《初食车螯》。

② 《宋史》卷329《邓綰传》。

标志。

宋代的粮食市场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城市经济的显著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成为重要的粮食消费市场。开封、临安人口均在百万以上，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都城、州、县三级城市体系，此外还有大量市镇。宋代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漆侠先生估计为 12% 以上^①。施坚雅 (William Skinner) 估计晚清时期人口城市化的比率为 5.1% 他推定在华北和江南两区，宋代城市人口较清代比例为高^② 可见宋代人口城市化比率是较高的。城市人口中除一部分有俸粮的官僚和城居地主外，都要依赖商品粮为生，所以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粮食消费市场。如南宋杭州“杭城除有米之家 仰余而食 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往来又不与焉”^③。天禧元年 开封官场采米“以京十四场采米，令每场日加至百硕”^④ 仅官场所采就达每日 1400 石 其粮食消费量之大可见一斑。

二是宋代社会分工扩大，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他们已与农业生产脱离关系，所需生活用粮必须依靠向市场购买商品粮。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最先论过这个问题。宋代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如纺织业机户、坑冶业的坑冶户、从事造纸业的纸户等等大量出现于宋代文献资料中，说明这支专业手工业队伍数量很大。此外还有专门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劳动者，已经脱离粮食生产，如从事茶叶生产和种植的园户、从事蔬菜和药材种植的圃户、从事水果种植的各种专业户等等，也都是商品粮的消费者。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 933 页。

^② 费维恺：《宋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与中国经济》载《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 37 之 7。

三是一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人多地少，自身粮食生产不足，所缺部分需要通过贸易形式从外地输入。如宋代福建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长期依赖于粮食输入。“闽地狭田少，岁积广米，每患客舟不时至”^①福州、泉州等地则是本地所产仅能维持半年，半年所需则求之商品粮；福与兴、泉土产素薄，虽当上熟，仅及半年，专仰南北之商转贩以给”^②。严州“州境山谷居多，地瘠且狭，民畜而贫，谷食不足，惟蚕桑是务，更蒸茶割漆，以要商贾迁之利”^③；严不产米，其来已久，每视上游之商舟至否为之丰欠”^④。建康府“民物所萃，食焉者众，生之者寡，岁仰余客贩，长江天险，舟不时至，价辄翔踊，……故居民盼盼日视帆樯去来为岁休”^⑤。杭州早在北宋时就已是“自来土产米谷不多，全仰苏湖常秀等州般运米斛接济”^⑥。富阳县“地狭而人稠，土瘠而收薄，通县计之，仅支半岁，半岁所食悉仰商贩”^⑦。歙州“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⑧。这些地区在宋代一直是靠商品粮的输入来弥补产粮的不足。由于地少人众，多余的劳动力便利用本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手工业，输出手工业产品和经济作物。在另外一些地区，农业发展程度较高，或者地多人少，有大量余粮可供输出，如苏、湖、常、秀等州以及广东都是粮食输出区。宋代广东的开发程度虽还较低，但是由于地广人稀，余粮较多，在宋代一直是粮食输出区，每年都有不少粮食供给于福建等

① 周必大：《文忠集》卷 67《汪大猷神道碑》。

②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 15《奏乞拔平江百万仓米赈粟福建四州状》。

③ 《严州图经》卷 1。

④ 王柏：《鲁斋集》卷 8《答严陵史君书》。

⑤ 刘宰：《漫塘集》卷 22《建康平止仓免回税记》。

⑥ 苏轼：《东坡全集》卷 56《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

⑦ 程秘：《洛水集》卷 19《壬申富阳劝农文》。

⑧ 罗愿：《新安志》。

地。苏、湖、常、秀等州地处太湖流域，自然条件好，粮食出产丰富，也大量输出余粮。苏轼说：“本路浙西，唯苏、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饱数路，漕输京师。自杭、睦以东，衢、婺等州谓之上乡，所产微薄，不了本土所食。里谚云：上乡熟不抵下乡一锅粥，盖所仰苏、秀等州商贩运以足官私之用。”^① 上述这些地区都是稳定的粮食输入区和输出区，就粮食输入区来说，要输入粮食，必须同时有手工业品和经济作物的输出，只有这样，地区间的贸易才能进行，所以严州输出丝织品和茶、漆，歙州则在从江西输入米的同时，输出茶、漆、纸、木等。这种经济关系已可看作稳定的地区分工关系。

四是丰歉调节、丰歉互补。这里明显有地区间的丰歉互补，各地区丰歉不平衡，有些地区虽非粮食输入区，但是在遭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年份，粮食不足，则需由外地输入粮食以补不足。如潮州“时和岁丰，固无乏绝，年或不登，仰给循海”^②。我国国土辽阔，自然气候条件差别较大，宋代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平常总是在一些地区丰收的时候，另一些地区却因自然灾害而歉收，所以丰歉调剂是粮食商品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③。地区间丰歉调剂的数量有时是很大的，如范纯仁曾知襄邑县，县境久旱不雨，范纯仁籍境内贾舟，命他们贩粮，贮存于佛寺。“众贾从命，所蓄十数万斛。至春，诸县皆饥，独境内民不知也。”^④ 除地区间的丰歉调剂外，还有丰年与歉年的调剂、季节性的调剂，即灾荒歉收年份和青黄不接的春冬之际，中下户多要向市场购买生活用粮和种子，而商人和地主则在丰年和收获季节采买粮食，在缺粮时卖出。

① 《东坡全集》卷 65《论浙西闭籴状》。

② 许应龙：《东涧集》卷 13《初至潮州劝农文》。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④ 《宋史》卷 314《范纯仁传》。

五是政府和余。宋代政府财政结构中，货币收入比例逐步增大，税粮收入难以完全满足需要，所以对和余的依赖越来越大，政府成为市场商品粮的大买主，马端临说：“至于宋而余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①北宋时河北和西北边境驻军用粮多仰赖和余。“比岁以来，三路人中粮草，度支給还价钱，常至一千万贯上下”^②在东南也有和余，“江浙诸路岁余米二百万石”^③。南宋则更是“恃和余以足粮粮”，政府的和余是粮食商品化的重要内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粮食大量商品化的同时向市场提供粮食的农业生产并不是商品生产。商品粮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小农的余粮甚至是生活用粮。小农经济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很难与市场割舍开来，农民为了购买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以及交纳赋税，必须向市场出售粮食以获取货币。方勺说：“望吴侬之野 茅屋炊烟 无穷无极 皆佃户也”，予见佃户携米 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 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醋、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 皆以米准之 整日得米数十石 每一百石 舟运至杭、至秀、至姑苏柴钱 复买货归售”^④。叶适也讲到湖南的情况：“江湖连接 无地不通，一舟出门 万里惟意 无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 余米尽以贸易 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柴，以规厚利。”^⑤农民出卖自己数量不多的粮食，“尽将精好输公赋 次打升斗求市人”^⑥，这就是宋代小农与市场联系的真实情况，农民小额余粮的涓涓细流经过地方小市场的集中汇聚到商品粮的大河中来，尽管就每个小农家庭来说，他所提供的商品粮数量很小，但是

① 《文献通考》卷 21《市余二》。

② 张方平：《乐全集》卷 23《再上国计事》。

③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④ 方回：《古今考续考》。

⑤ 叶适：《水心集》卷 1《上宁宗皇帝札子》。

⑥ 张舜民：《画墁集》卷 1。

市场与小农经济联系的普遍性，使得小农余粮的商品化成为商品粮的一个重要来源。商品粮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地主的租粮收入。宋代土地集中，使大量粮食以地租形式集中于地主手中，地主家庭人数有限，消费量不大，大量地租收入也会转化为商品粮。“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独饮而自食之，其势必糗而取钱以给家人之用。”^①上述两方面商品粮的来源都不是商品生产。

纺织品是宋代的重要商品。纺织品的消费市场也是多方面的，城市中居民消费的布帛多是商品，一般城市中都有出售布帛的彩帛铺如开封潘楼街之“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巷之“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②。临安也有许多著名的彩帛铺，如陈家彩帛铺、市西坊北钮家彩帛铺、徐家绒线铺、清河坊顾家彩帛铺等^③。诸行市中有丝锦市、生帛市、故衣市、衣绢市、处布行、麻布行、麻线行等出售纺织品的行市^④，出售纺织品的行铺在各城市中属于最大的行铺之列。有些地区不适合纺织业发展，所需布帛通过商业渠道输入，如秦观《海康书事》所言“裔土桑柘稀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船纲客。”^⑤这是说海康县蚕桑业不发达，所需丝织品由商人贩运而来。宋代此类情况很多如《嘉泰会稽志》称“今越人衣葛出自闽贾”；“强口布以麻为之出于剡机织殊粗而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市之”^⑥。宋代四川、河北等地丝织业都很发达，号称衣被天下，其产品很大部分是以商品形式流通的，如“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天下而贡输商旅之往来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

① 《朱文公文集》卷 25《与建宁傅守札子》。

②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 2 东南楼街巷。
吴自牧：《梦粱录》卷 13 铺席。

④ 《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

⑤ 《淮海集》卷 6。

⑥ 《嘉泰会稽志》卷 17 布帛。

里之外^①。宋代从事纺织品贩运的商人很多，经营数量很大，说明纺织品贸易的兴盛。《夷坚志》中著名的《陈泰冤梦》说陈泰是一位纺织品买卖的商人，他的商品来源于崇仁、乐安、全溪等地，各地都有代理人为其经营，仅一地就“积布数千匹”^②，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大。北宋时苏山民郑旻从事纱的买卖，因偷漏税败露，官府“取其簿计，积计不税者几万端”^③。这些都说明宋代市场上纺织品是很重要的商品，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手工业纺织业的产品商品化程度是较高的。

宋代市场上的商品布帛一部分来自于小农的家庭手工业，一部分则来自纺织专业户——机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生产单位模式，宋代耕织结合的家庭经济也向市场提供商品，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纺织业专业分工的趋势，使原先作为小农家庭经济组成部分的纺织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宋代有数量可观的机户，他们的产品是为出卖而生产的，所以其生产也已成为商品生产。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城市的消费性大于生产性，但是宋代某些城市生产性的一方面有所发展，在这些城市中集中了一些手工业生产者，他们是城市的商品生产者。婺州是丝织业发达的地区，婺州东阳县城“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④，同属婺州的金华县城，“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⑤。这是城市成为商品生产基地的突出例子，全国此类城市当不止此二城而已。宋代一些地区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行业，出现了专业性分工的趋向。如吴兴地区，陈翥说该地区人民“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二十斤，

① 《居士集》卷 39《峡州至喜亭记》。

洪迈：《夷坚志·支志·癸》卷 5《陈泰冤梦》。

③ 《咸淳临安志》卷 89《纪事》。

④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 10《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

刘敞：《公是集》卷 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

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伴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①。《吴兴志》也说：“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数百箔，兼工织。”^②他们已经脱离农业生产，是专门的商品生产者，是稳定的商品提供者。关于宋代的纺织生产能力，当时人说：“三日不织织，一匹才可剪。”^③《夷坚志》记饶州安仁县一位并非以纺织为专业的老妇“辛苦看蚕缉麻苧，三年艰辛，织得绸绢三十匹，布十五匹”^④。由众多的专业或非专业的纺织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必然是很可观的。

作为小生产者的纺织手工业者以及小农向市场提供商品，同时也向市场购买商品，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就上述纺织手工业者来说，他们所需的粮食要向市场购买。不仅如此，一些生产资料也依赖于市场，如那些城市中的机户，他们并不种桑养蚕，生产所用原料蚕丝是从市场购买的。宋代养蚕所用的桑叶也已成为商品，郑獬《买桑》诗云：“出持旧粟买桑叶，满斗才换几十钱，桑贵粟贱不相直，老蚕仰首将三眠。”^⑤《夷坚志》记载了几则因桑贵而发生的故事，绍兴六年“淮上桑叶价翔涌，有村民……育蚕数十箔，与其妻子谋曰：吾比岁事蚕，费至多，计所得不足取偿，且坐耗日力，不若尽去之，载见叶货之如皋，役不过三日，而享厚利，且无害”^⑥。乾道六年“信州桑叶骤贵，斤直百钱。沙溪民张六翁有叶千斤，育蚕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与子妇曰：吾家见叶以饲蚕，尚欠其半，若如今价，安得百千以买，脱或不熟，为将奈

陈旉：《农书》卷下。

谈钥：《吴兴志》卷 20。

文同：《丹渊集》卷 3《织妇怨》。

① 《夷坚志·三志·己》卷 9《曹三妻》。

郑獬：《郾溪集》卷 26《买桑》。

⑥ 《夷坚志·甲志》卷 5《江阴民》。

何？今宜悉举箔投于江，而采叶出售，不唯百千可立得，且径快省事’^①。淮山村民育蚕数十箔，足见他是专门种桑养蚕的，沙溪民张六翁要继续维持生产则要用百贯钱买桑，也可见生产中货币资本投入不少。洪迈是当作报应故事来讲述的，但是它却反映出专业小生产者与市场的紧密联系，它们再也不是与市场隔绝，市场的变幻对他们已不是毫无关系，小生产者对市场再也不是不闻不问，而是随市场情况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虽然上述小生产者市场情况的风云变幻中失败了，成了洪迈笔下报应故事的主角，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宋代象这样与市场关系密切的小生产者是比较普遍的。

不仅小手工业者如此，就一般小农来说同样无法完全避免与市场发生联系。苏辙《蚕市》诗说：“倾困计口卖余粟 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筐供妇女，亦有鋤铧资男耕。”^②在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中，养蚕种田的工具要向市场购买。“田农之家往往举息钱以市种与牛乃克播种”^③不仅耕牛要向市场购买 甚至有时种子也要求之市场。苏轼《奏淮南闭余状》中曾提及浙西汝阳民朱宪因旱伤绝收 到淮南购买稻种^④。由于赋税和地租常常剥夺农民的必要生活资料，致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反而要买粮度日，至于凶年更是如此，李觏《谷贱伤农 谷贵亦伤农》的议论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上引苏轼奏中也曾提及汝阳民杨怀“本庄不熟，遂典田土，得钱于淮南收余到纳税及供家吃用米四硕”^⑤。因为宋代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普遍性 所以宋人说：“今之农与古之农异。”^⑥

① 《夷坚志·丁志》卷 6《张翁杀蚕》。

② 苏辙：《栞城集》卷 1《蚕市》。

祖无择：《龙学文集》卷 10《谢雨祝文》。

④ 《东坡全集》卷 60《奏淮南闭余状二首》。

⑤ 《东坡全集》卷 60《奏淮南闭余状二首》。

⑥ 王柏：《鲁斋集》卷 7《社仓利书书》。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上述特点还可以从市场分布的格局来加以说明。宋代的体系除了传统的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外，还涌现了数量众多的市镇，这些市镇是在城市之外的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的。从《宋会要·商税杂录》以及宋代地方志的记载看，每个城市周围都有若干市镇，分布广泛，数量很大。在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如此密集的市场是前所未有的，它说明市场分布已突破了前代市场仅仅局限于政治中心和几个交通要道的传统，而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市镇成为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与市场联系的纽带。通过这些市镇，农村的粮食和手工业产品转化为商品，汇入商品经济的大河中去，同时小农和手工业生产者也从市场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宋代市镇涌现的意义正在于，它说明了商品经济同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广泛联系，商品经济发展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这与粮食和布帛成为流通中的主要商品的趋势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代商品经济的特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生产的发展和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比率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和布帛成为主要商品，这就与战国秦汉时期以盐铁为代表的地区特产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基础是坚实的。但是也要看到，为市场提供商品的生产仍然主要是家庭小生产，提供粮食和布帛商品的小农经济仍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济，宋代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机户一般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小商品生产者。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宋代的货币制度。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货币单位价值的大小、货币流通量等必然决定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宋代货币制度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其具有异常的复杂性。铜钱仍是主要的货币，其铸造量、流通量都很大，但是铜钱已不能完全满足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一面也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作为信用货币的纸币和有价证券产生于宋代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贵金属货

币白银开始在商品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政府的财政需要，落后的铁钱仍强制在一定区域内使用，并给商品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宋代的商品经济仍然是建立在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都很小，他们的生产属小商品生产或非商品生产，这就决定了市场交易零细性的特点。每个生产单位都是把自己数量不多，价值不大的产品投入市场，也从市场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小商品，因此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就适应于这种小商品生产，因而铜钱在宋代仍然是主要的货币。由于小生产者与市场联系的普遍性，市场交易的商品总量是很大的，所以又决定了铜钱的需要量很大。铜钱是宋代的主要流通手段，不仅指铜钱数量大、流通地域广，而且铜钱是宋代标准的价值尺度，不仅商品的价格主要以铜钱来表示，就是其他各种货币也都以铜钱为标准来确定其购买力，如四川、陕西、两淮等地的铁钱都是政府以铜钱为标准确定其比价，至于南宋会子则更是代表铜钱来流通，其单位直接就是铜钱的单位。白银在宋代已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但是宋代用白银为价值尺度的情况很少，白银的价值也是用铜钱来表示的。

铜钱虽适合于小额交易 但是由于它单位价值小重量大 所以在货币财富的转移、商业资本的携带、价值较大的交易等场合又显得很不适用。宋代生产单位虽小，但是来自小生产者的商品经过市场汇聚，商品交易额是很大的，商业交换已突破了小商品交换和小市场的局限，商业贸易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交易动辄千万贯。地区间的商品交流很兴盛。宋人说“耕垦利于近，商贾利于远”^①，长途贩运往往是古代商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巨额的商业利润常靠地区间的商品差价来获得。宋代商人特别活跃，他们运输数额庞大的货物，车载船运，跨州连郡以求利，宋代政府财政收支

^① 《长编》卷 267 熙宁八年八月癸巳。

中货币所占比例很大，大量货币的运输难以避免，在这些方面，笨重的铜钱是很不便的。纸币轻便，容易携带，于是在宋代发展起来，贵金属白银也在商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纸币的产生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说明现行货币制度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纸币产生于四川是由于四川发达的商品经济与落后的铁钱制度并存，使得货币制度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在这里表现的最为尖锐。漆侠先生从必然性和偶然性两方面来说明交子产生的原因，其必然性的一面是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商业信用的普遍发展，其偶然性的一面是四川商品经济与货币制度的矛盾。在铜钱地区，商品经济与货币制度的矛盾虽不像在四川那样突出，但同样是存在的，因而也有各种解决办法，如入便制度，既有政府所设立的入便制，也存在民间的兑便制和有价证券的广泛流通。宋代有价证券种类很多如度牒、盐钞、茶引等等商人用之以克服铜钱运输的困难，“度牒、关钞大商贾之轻资也”^②，这些都表明纸币制度的普遍推行有其必要性，到了南宋，纸币终于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由于同样的原因宋代白银的使用更加广泛由于它价值大重量轻体积小，易于携带，以及价格较稳定等优势，特别是在商人和政府的大额货币财富的转移方面白银被作为“轻资”而使用。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建立在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特点，又决定了白银只是在大额交易和大量货币财富转移时以“轻资”的身份出现，很少用于物价的表示，宋代价值尺度的职能仍然主要为铜钱所占据着。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对货币制度的决定性影响。

宋代货币制度还受到另一方面的影响，就是政府的作用，王者制钱说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货币思想，货币被认为是人主之

① 《宋代经济史》下册第 1064 页。

②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 35《宋故左中大夫直宝文阁致仕李公墓志铭》。

操柄 是根据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夫钱本无用而物为之用 钱本无重轻而物为之重轻，此圣智之术，国之利柄也”^① 货币思想是名目论，铸币被看作是财政手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宋政府出于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不断铸造铁钱并将其流通领域一再扩大，如果说四川铁钱有其历史继承性的一面，宋政府受财力限制不得已加以保留，那么西北和两淮、荆湖的铁钱则完全出于政府的财政需要。铁比之铜，是价值更低的金属，用铁钱充当价值尺度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特别是铁钱的推行使宋朝统一政权下存在不同的货币流通区，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北宋时期由于信用制度的实施，这一不利影响，尚能较好地克服，但是在南宋，货币制度的不统一则使两淮、荆湖地区与江南的商品交流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上述商品货币经济的特点是影响宋代币制和货币流通的重要因素。

二、货币与宋代社会经济生活

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财富形式，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难以知道全部社会财富以多大比例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货币对宋代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看出货币的作用是很大的。正如叶适所说：“唐以开元天宝以后 天下苦于用兵 朝廷急于兴利，一向务多钱以济急 如茶酒盐铁等末利既兴 故自肃代以来 渐渐以末利征天下 反求钱于民间 上下相征 虽私家用度 亦非钱不行 天下之物隐没不见 而

周行己：《浮沚集》卷 1《上皇帝书》。

通行于世者 惟钱耳。^① 虽然叶适说的是自唐后期以来，但他所强调的是宋代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货币与国家财政、货币与人民生活、货币与生产及社会关系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

（一）货币与国家财政

宋代财政中货币收入激增以及货币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增加，集中体现了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扩大。几十年前，全汉升先生作《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一文论述这一问题 全先生得出结论：“由于物品生产、消费和交换的发达 以及钱币供给的增加，北宋政府自专卖事业及商税中征收到大量的钱币，故当日岁入钱数能继续唐中叶以后增加的趋势而作激剧的增加。”并且说：“货币经济在唐安史之乱以后三百余年的期间内越来越向前发展，渐渐把中古以来曾经占过优势的自然经济的地位取而代之。”^② 在今天我们看来，说货币经济已取代自然经济虽属言过其实，但北宋商品经济发展使政府货币收入大量增加则是事实。全先生文章中的表十一为《唐宋岁入钱物数量之比较》，转用于此 其中元祐元年的数字系根据苏辙《元祐会计录序》 实际为元丰八年的数字，将其改正。

年代 种类	天宝八年	天禧五年	嘉祐年间	元丰八年
钱(贯)	2,000,000+	26,530,000	36,822,541	48,480,000
谷物(石)	25,000,000	29,830,000	26,943,575	24,450,000
布匹(匹)	23,450,000	14,558,000	8,745,535	1,510,000
绵(两)	11,100,000	18,991,000		

本表显示出 北宋财政收入构成与唐相比 货币收入增加 而

^①《文献通考》卷 9 水心叶氏曰。

^②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